

● 杜素娟 著

山東畫報出版社

沈从文与《大公报》

大公报

○ 杜素娟 著

山東畫報出版社

沈从文与《大公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沈从文与《大公报》 / 杜素娟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6.5

ISBN 7-80713-295-7

I. 沈... II. 杜... III. 沈从文 (1902~1988) 一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8041 号

责任编辑 苏海坡

特邀编辑 陈海东

封面设计 李海峰

版式设计 苏海坡 张秀智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042 82098047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bc@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12.25 印张 163 幅图 13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定 价 1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建议图书分类: 文学



目 录

《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前缘后果

《大公报》的来龙去脉	1
非官非商的文人色彩	11
“报尾巴”	14
国学大师和《文学副刊》	18
沈从文三度入京	25
面目一新的《文艺副刊》	31
达子营的家庭作坊	35
萧乾初试锋芒	41
易名《文艺》	49

纯文学的芳草地

30年代文坛的“南辕北辙”	53
托起“京派”	61
一脉而出的《文学杂志》	65
一个流派和一种思潮	69
远离革命和政治	72
拒绝杂文	78
只认作品不认人	83
为技巧申冤	86
不许“白相”	89
文艺界第一个文艺奖金	93



一个优秀的编辑传统	99
《文艺副刊》的一大特色是书评	105

清风细雨淡如斯

沈家的食客	111
“太太客厅”里的绝代才女	115
谦谦君子朱自清	119
慈慧殿三号的“一高一矮”	123
汉园三杰	129
闲来随分种胡麻	133
废名入禅	137
童心不泯的金岳霖	140
志摩之死	144
胡适做媒	148
谁发现了《雷雨》？	153
一位南方来客	158

淡泊背后是激情

丁玲事件	164
京沪之争	170
“差不多”和“反差不多”	177
沈从文和鲁迅：不该发生的故事	180
和洋人们做邻居	185
沈从文与江青	189



《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前缘后果

《大公报》的来龙去脉

在解放以前，全国最著名、最有影响的一份报纸应该算是《大公报》。

第一，它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民间性质的“民办”报纸。第二，它也是我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一份报纸。它最早是在清朝末年创办的，中间经过了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现在还在香港发行、生存着。第三，它影响深远，发行量在国内居于前列，是第一个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奖章的亚洲报纸。

同时，《大公报》也是历经坎坷的一份报纸。它走过了一条极其曲折和复杂的发展之路，几次停刊又几次复刊，编辑换了一拨又一拨，后面的人和前面的人已经没有一点关系了。可以说，《大公



1941年，《大公报》以其反法西斯主义的报道成为亚洲第一份获美国密苏里新闻奖章的报纸。图为密苏里新闻奖章正面。



密苏里新闻奖章背面



报》是一批批、一代代热爱报业的报人呕心沥血，靠热情和毅力才得以传继的一份名报。

《大公报》最早是由维新人士、天主教徒英敛之创办起来的。

英敛之是个有意思的人。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满洲正红旗人，但是他对当时晚清的反对却十分激烈。他自幼博读群书，学识渊博，在政治上也很有远见卓识，又是正宗旗人，本可以走一条官宦之路。可是，他痛恨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对官场的黑暗更是深恶痛绝。于是，他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一辈子不入仕途，不做官，远离官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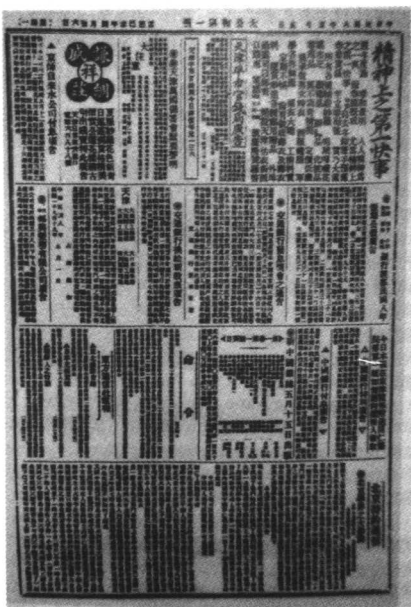
但是，英敛之却做不到对国家大事充耳不闻。实际上，他对于国家的社会风云和政治动荡都极其敏感和关注。他对于国家现状的忧虑及其前途的思索从没有停过。他梦想在政权体系之外，找一条更为行之有效的救国之路。

有一次，他聆听了西方传道士的说教，对天主教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他萌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用宗教引导人的心灵，进行道德的教化，从而建立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培养人们的社会良知。他想，如果人人都信奉了天主教，摒弃邪恶和私欲，一心向善，国家

不就有救了吗？在这样的梦想支持下，他加入了天主教，热心做各种宗教工作，希望在宗教中找到救国的道路。

当然，这是一个多少有些幼稚的梦想：宗教固然可以安慰心灵，但却无法根除社会的弊病，对于晚清昏聩黯淡的政治局势更是束手无策。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了维新变法运动。英敛之非常激动，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救国良方。和当时很多有志之士一样，他积极参加了维新变法，还写了一篇《论兴利必先除弊》的文章，慷慨激昂地为改良帝



《大公报》对五四运动的报道



制的维新思想呐喊，言辞十分激烈。

没想到，维新变法很快就失败了。清廷大肆逮捕维新人士，北京城内一时阴云密布。作为一个活跃分子，英敛之也被清廷注意上了。为了生命安全，他被迫逃难。英敛之从北京南下，度过了一段东躲西藏的艰难日子。

1901年，风声不太紧了，英敛之北上。他没有直接回北京，而是在天津落下脚，寻找发展的机会。因为天主教的关系，他在天津结识了一个天主教友，名叫柴天宠。柴天宠刚刚发了一笔小财，想用手中的资金创设一点可以发展的基业。当时办报纸是一种新兴事业，很时髦，利润也还不错。柴天宠很羡慕，就打算用手中的钱开个报馆，办一份报纸。就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教友英敛之。柴天宠有钱却没有办报的才华，英敛之满腹锦绣，却正愁无钱。两人可以说是一拍即和。

两人于是商议，由英敛之负责所有的报务，柴天宠负责筹集资金。办报馆不是一件小事情，柴天宠手中的钱不够使用。他们想到了用集股筹集资金的形式。这在当时也算是一种新兴的经济策略。柴天宠倾其所有，同时动员熟识或不熟识的众多天主教徒为他们的报馆入股。在他们的鼓动下，不少人为支持这种新生事物慷慨解囊。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有名的维新人士严复当时就为他们的报馆投了千元的股份。

经过一段艰难的筹备，1902年6月17日（光绪二十八年），他们的第一张报纸终于诞生了，取名为《大公报》。英敛之解释说，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要用这张报纸为公众服务，开风气，启民智，为民请命，替众发言；以“大公之心”，“扬正抑邪”，“知无不言”。报名用中法两种文字写出，中文的“大公报”三字报头用隶书写出，显得方正敦厚；法文是“L'Impareial”，意思是“无私”。这时候的《大公报》还十分简陋，只有一张单面，用中国的毛边纸印刷，每天只发行3800份。报馆一开始设在天津法租界狄总领事路（现在的天津哈尔滨道42号），后来搬到日租界旭街21号。报馆的成员很少，经理、编辑、撰写都由英敛之一人承担。因为缺少人手，英敛之的太太也来帮忙，没想到她撰写的宫廷新闻竟然大受读者欢迎。

虽然条件极其艰苦，《大公报》还是很快得到了读者的认可与



喜爱。英敛之的确是一位富有天赋的报人，对于办报他有很多独特的想法。

当时一般的报纸，都只是比较单纯的新闻报道。英敛之独辟蹊径，除了报道新闻，还开设了一个名为“论说”的栏目，有点像今天的社论，专门就新近发生的社会新闻、政治事件进行分析评论。英敛之就是评论员。他的评论文章深入浅出、观点独到、言语精辟，洋溢着维新的进步思想。这是其他报纸所没有的。就这一项，就争取到了很多读者。社会上一有了什么大事，大家都喜欢买份《大公报》，看看英敛之的发言。

《大公报》趣味十分健康。当时很多报纸为了吸引读者，纷纷设立“消闲录”、“花丛谈”之类的栏目，大登黄色新闻、妓院艳闻、鬼怪奇谈，以低级趣味来拉拢读者。《大公报》却坚决排除这些内容。英敛之坚决提倡报纸趣味的健康色彩。他追求的目标是在健康、严肃中见活泼。有一次，工作人员在凑版面的时候，误登了一条“暗藏春色”的新闻，英敛之发现后，立即做了处理。因为有一批报纸已经发送出去了，他急忙写了致歉书，登在后面的报纸上。另外，贴近普通百姓也是《大公报》的一条办报思路。当时的报纸大多使用的还是文言文，对读者的文化修养有较高的要求。而当时的普通百姓大多文化水平不高，粗通笔墨已是了不起的“文化人”了。为了让这些普通百姓也能看懂《大公报》，成为报纸的读者，《大公报》的一些内容就不使用文言文，而是用京津两地的土话来写，读起来生动活泼、通俗亲切。



采访课

由于上述种种因素，《大公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渐渐站住了脚跟，从一个不知名的小报，发展成为京津一带的头号名报。

英敛之主持《大公报》达十年之久，直到1912



年，才辞去《大公报》的职务。

创办《大公报》十年来，英敛之除了负责股东们的权益，维持报纸的商业利润之外，更为用心的就是利用《大公报》这块阵地，不断宣扬他所投身其中的维新思想。他希望用《大公报》使维新思想

深入人心，完成维新变法未竟的事业。

1912年，曾经出卖维新变法、直接导致变法失败的袁世凯竟做了民国总统。对袁世凯一向十分痛恨的英敛之愤慨之极。在此之前，英敛之曾在《大公报》上十年如一日，“骂袁”不懈，毫不客气地称袁世凯为“国贼”、“小人”，是当时的一大人文风景。没想到袁世凯竟做了总统！这对英敛之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他对现实感到彻底地心灰意冷。

悲愤不已的英敛之决定从此退隐，再不涉足报界。他说到做到，以后果然再没涉足过这个领域。他把后半生的精力大部分都献给了宗教和慈善工作。

这对于《大公报》甚至整个报界都不能说不是一个重大的损失。英敛之的退出，结束了《大公报》的第一段黄金时期，也就是人们所称的“英敛之时期”。

“英敛之时期”结束后，《大公报》就一天不如一天地衰落了。

在《大公报》的大股东中，有一个叫王郅隆的人。此人和当时的安福系军阀关系十分密切。在安福系军阀的怂恿和支持下，王郅隆把破烂不堪的《大公报》买了下来，收购了所有的股权，重新组织人手续办《大公报》，目的是把它变成安福系军阀的机关报。王郅隆雇佣了胡政之做经理人、编辑者和主笔，开始了《大公报》的“王郅隆时期”。

胡政之，名霖，四川人。他接手《大公报》时还非常年轻，只有27岁。他出身晚清低级官吏家庭，少年时进入西式学堂接受新



胡政之（左二）与同事合影。



新记《大公报》创办人之一张季鸾

式教育，青年时期留学日本。胡政之在日本学的是法律，但他却是一个报纸经营管理的天才。上任后，他大刀阔斧地对《大公报》进行了很多改革。在他的主持下，已经沦为军阀机关报的《大公报》居然也办出了一定的特色，这是很不容易的。1918年，胡政之代表《大公报》采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成为这次会议上惟一的中国记者。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扩大了《大公报》的影响。《大公报》在胡政之的苦心经营下，曾一度重获生机。但是，这时候

的《大公报》已经失去了英敛之时期的独立性，在办报意图和办报资金上都严重地依附于安福系军阀。后来，安福系军阀在军阀混战中被直系军阀打败，《大公报》也就不可避免地跟着垮台了。胡政之被迫离开了《大公报》。

在此后的一个时期内，《大公报》几易其主，被买来换去，质量越来越差，不停地走下坡路，最后终于沦落到无以为继的地步。1925年，《大公报》被迫宣布彻底停刊。天津旭街21号，曾经热闹一时的《大公报》馆，终于挂上了一把大锁，在一派凄冷、衰败的气氛中，历经风吹雨打，渐渐屋坏墙塌。

谁也不敢想它还有重见天日的时候。

再说胡政之，他离开《大公报》之后，曾先后在几处报馆任职。当时的新闻界有一个黑暗的现实，那就是几乎所有的报纸都要依附于某个政治集团或政治党派，作为经济上和权势上的靠山。自然，这些报纸的发言也就服务于各自的主子。所以，报纸虽多，像样的却几乎没有。这种状况对胸怀壮志、一心要大展宏图、创一番事业的胡政之来说，自然是不能容忍的。他换一家报馆，再换一家报馆，始终觉得怀才不遇，难以施展自己的拳脚，实现自己的抱负。

胡政之有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名叫张季鸾。张季鸾是陕西



人，年龄、身世、经历和胡政之都十分相似，同样出身于低级官吏之家，同样留学日本，所以两人在一起都感到彼此意气相投。张季鸾此人当时在社会上也算得上是一个人物，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当过总统府的秘书，参与起草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袁世凯上台之后，他的政治信念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对政治感到绝望，从此离开政界。此后，他闯荡新闻界，因为文采十分出众，被看作是当时新闻界的“一支笔”。

胡、张二人都深切地感到受雇于人、受命于人的苦闷，悲叹空有满心的抱负和本事，却没地方施展。他们都认为，要想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办一张高水平的好报纸，成就一番大事业，就必须办一张独立的、不依附任何集团和贵威的报纸。但是，当时报纸的竞争也十分激烈，要创个新牌子，得到读者的认可，谈何容易。

有一次，他们在散步时经过倒闭的《大公报》报馆。两人不由地驻足观看。回想起它往日的繁盛，胡政之更是感慨万千，神色凄然。张季鸾突发奇想：“如果重办《大公报》岂不是比创个新牌子要省很多力气？”胡政之说：“好是好，可是到哪里去筹钱，购买《大公报》的创办权？”张季鸾沉吟半晌，说：“有一个人！去找鼎昌兄！”他们所说的“鼎昌兄”是当时金融界的一个名人吴鼎昌。

吴鼎昌也是留日学生。回国后，主要致力于金融实业，经过一番大拼，此时已经颇具实力。巧的是，他也有发展报纸实业的打算，所以当胡、张二人前去找他，提出设想和建议时，便欣然相许。就是这样的一线意念，把胡、张、吴三人联系到了一起。于是，三人决定紧密联手，共同复兴《大公报》。

1926年夏天，胡、张、吴三人从王郅隆的儿子手中把《大公报》的创办权、房



吴鼎昌（右）与张季鸾



产、设备和招牌一股脑儿尽数买回，成立了“大公报社新记公司”。吴鼎昌任社长，负责资金运转。胡政之任经理，负责经营管理。张季鸾任总编辑，负责笔务。

1926年9月1号，新记公司印出了自己的第一张《大公报》。这张报纸上的刊号标明是第8316号，因为以前的《大公报》总共办了8315期。报头的下面写着：“本馆创始自前清光绪二十八年即西历一千九百零一二年”，这些都是为了强调它的历史渊源。报头的字体采纳了原来的样式，使用隶书体，并且把原来的法文报头也保留下来，就为营造与原来《大公报》同出一脉的承继效果。报馆的地址仍旧在原来的天津日租界旭街21号，报馆的对面便是天津著名的四面钟。

就这样，历经劫难的《大公报》重获新生！《大公报》也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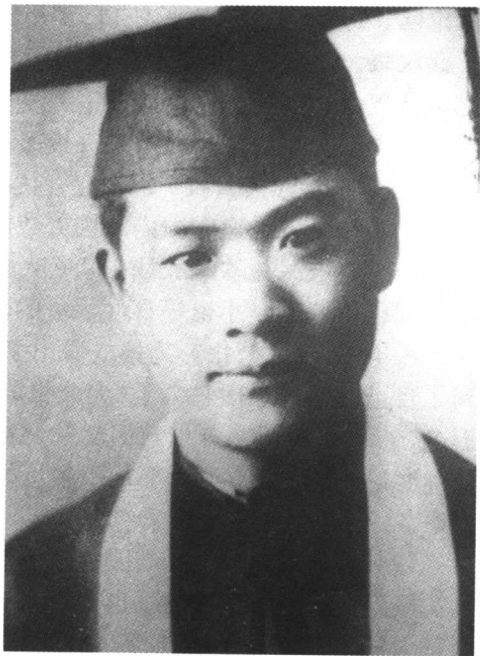
在人们的印象中，张季鸾相貌清隽，书生气十足，在编辑报纸上别有一套；胡政之先生则胖胖的，像个大老板，敏锐、精细，在人事和经济管理上更是运筹帷幄。二人搭配，真可谓是相得益彰，是一对难得的黄金搭档。他们任人惟贤，网罗了一大批精干的报业人才。像当时名气比较大的何心冷、杜协民、许萱伯、曹谷英、王文彬、王芸生、孔昭恺等都被他们纳于旗下，成为得力的干将。除了网络精英，他们也注意自己发掘人才和培养人才，比如范长江、徐盈、陈纪滢、杨刚、萧乾等后起之秀，都是在《大公报》这块富有生机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成为日后在新闻界颇富盛名的优秀编辑和记者。

新记大公报社是一个朝气蓬勃、团结敬业的集体。整个报社严谨有序，奖惩分明。制度严格但又不乏人情味。有一次，一位编辑因家庭贫困，为了多挣一点钱，就把《大公报》采访到的独家新闻偷偷透露给其他报纸。这算得上是很严重的违纪行为，理该严惩。但胡政之得知他的家庭情况之后，非但没有处罚，相反却给他加了薪。这样富有人情味的处理，感动了报社里的每一个人，极大地调动了职员的积极性。很多《大公报》的旧人都曾满怀感情地回忆说，《大公报》社里的气氛是最温暖和谐的，上下级的关系十分融洽。胡、张二人一直和普通职员一起上夜班。报社有免费的夜班宵夜，一般是烧饼，稀饭。胡、张二人和夜班职员们一起进餐，说说笑笑，



气氛热闹。他们二人精力充沛，头脑清晰，工作效率极高，又极其敬业，给全体职员树立了榜样。《大公报》的兴旺发达也就是水到渠成、很自然的事了。

新记公司的《大公报》内容丰富、版面精美而不失活泼；当然，最与众不同的还是它的新闻的准确性和时效性。比如，《大公报》要求它的编辑和记者必须学会翻译电报。记者采访到一条新闻，马上自己翻译成电文，交到邮局，立刻就能发拍，这样就避免了在邮局的时间延误；编辑接到电文后，也无需等邮局翻译，自己翻译了，立刻



新记《大公报》成为培养中国报人的摇篮，出现了范长江、萧乾等后起之秀。图为1935年的萧乾。

就能付印，保证了新闻的时效性。《大公报》在新闻报道上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实行专电、特写、专访和通讯一条龙的报道方式。在报道一条新闻时，先用快捷简短的专电，在报纸上发布短消息，为的是准确迅速地把新闻告知读者。接下来围绕这条消息，组织具体、详细的专访和通讯。这样可以告诉读者更多生动的细节和深刻的意义。这样一来，就使《大公报》的新闻报道不仅迅速而且详细，不仅准确而且好看，受到读者热烈的欢迎。

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年代的天津，就有了这样一个流传的说法：“天津有三宝，永利（化学公司）、南开（大学）、《大公报》。”新记公司《大公报》的成功，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闻名于京津两地的《大公报》已经不满足于它现有的成绩。1936年，它创办了上海版，每天津、沪两版同时发行。它的发售区域从京津地区，发展到了全国；发行量从最初的2000份，发展到十几万份，最多每天发行到二十多万份。抗日战争爆发后，天



津沦陷，《大公报》天津版停刊。《大公报》先是迁移到武汉，创办了武汉版。武汉告急时，又迁移到四川，创办了渝版。后来，胡政之亲自出马，带领一批得力人手到了香港，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毅力在香港开设了《大公报》的香港版。

抗战期间，《大公报》密切配合抗战形势，热情支持反日抗战。它的记者和通讯员遍布国内和国外战场。比如，著名记者、文学家萧乾当时就被派往欧洲战场，报道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同时，它的副刊也用诗歌、小说等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抗战、鼓舞斗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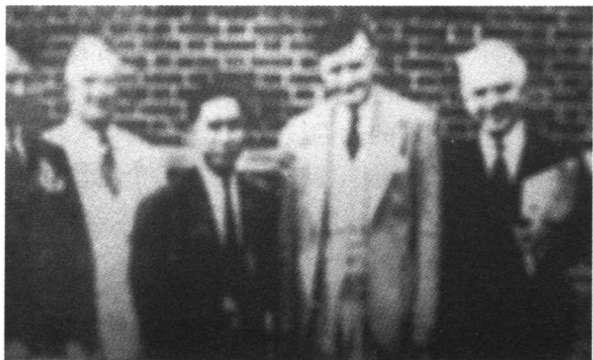
八年间，《大公报》为抗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也在战争中达到了自己的顶峰。1941年，《大公报》以其杰出的新闻成就和社会影响，得到了美国密苏里新闻奖章。这是中国报纸惟一的一次赢得国际奖励。这在整个亚洲都是不多见的，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大盛事。

1945年底，抗战结束，因为战争而停刊的《大公报》上海版复刊。接着，天津版、香港版也先后复刊。于是，津、沪、渝、港四版每天同时在全国各地刊行，一度盛况空前。

从1926年到1945年，在胡、张、吴三人主持新记公司时期，《大公报》达到了它在历史上的最繁荣时期。

1949年全国解放，因为政治因素的影响，《大公报》在大陆上的各版基本上都停刊，进行了各种改组。

《大公报》在对待国共两党的斗争上，态度比较复杂，在一定程度上曾支持过国民党政权，也发表过一些不利于共产党的言论。



1941年，《大公报》喜获美国密苏里新闻奖章，“中央通讯社”卢祺新代为领奖。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自指示下，《大公报》各版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大公报》重庆版改组为《重庆日报》，《大公报》天津版改组为《进步日报》。1952年，《大公报》上海版与



天津《进步日报》合并，仍名《大公报》。由于时代的影响，这个《大公报》和原有的《大公报》在办报思路、办报风格上都有着很大的区别。“文革”爆发后，这个《大公报》就停刊了。

能够维持《大公报》原有风貌的只剩下一个香港版，在香港发行至今。它的发行区域现在已经扩展到了世界各地，先后发展了中文海外版、英文版、美洲航空版。从1985年开始，美洲航空版每天用卫星传真在美国印刷发行。1980年，《大公报》被联合国特别研究委员会推荐为全世界最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陈列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哈马舍尔图书馆，供人们翻阅。

非官非商的文人色彩

《大公报》之所以能够成功，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由它自身的性质决定的。历来的报纸，从性质上来说，非官既商。也就是说，有的报纸是官办、党办，这种报纸附属于某个政治集团；而有的则是商办，是纯粹的赢利目的。前者可以得到权利的保护和财力上的支持，但另一方面它的言论和命运也就被政治所束缚和左右。商办的报纸则被利润所束缚，一举一动都要以利润为准则，所以也很难办出光彩。

《大公报》却完全不同，它既非官办，亦非商办，而是由文人所办的民间性质的报纸。它是从民间的、民众的立场出发，以文人的正义感来看政治、评时局，代表民众的愿望和声音，也是文人论政的园地。它一方面追求民间性，一方面保持文人本色，是中国新闻史上少有的保持文人论政色彩的报纸。

第一代创始人英敛之曾一再申明：“本报志在开通风气，非牟利可比。”此言意在和商办报纸划清界限。他又在报社中立下规定：报社职员绝对不能兼任公职，不为任何党派作宣传。这便和一切党派团体划清了界限。他在《大公报出版弁言》中宣布：本报“知无不言，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非以挟私挟嫌为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意思是，报纸的主旨是代公众发言，不避政嫌。

在英敛之主持时期，《大公报》也确实像它的名字一样，遵守着它的承诺，一直努力为大众服务，做到了为民请命，“知无不言”。



《大公报》明确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八字方针。

“论说”，对黑暗面竭尽嘻笑怒骂、讽刺挖苦之能事。不仅高官权贵被骂得淋漓尽致，就连慈禧太后，也被屡屡指责。当然挨骂最多的就是袁世凯，袁世凯这三个字，在《大公报》的版面上，就从来没有单独出现过，前面总是带着很多形容词，如：小人、恶贼等等花样不一。这样的“论说”，每个月都有二十多篇。

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是个例外，它沦为安福系军阀的机关报，成了一张官办报纸。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它才不能长久，更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最终随着安福系的垮台而倒闭。

正是因为这个教训，胡政之和张季鸾更是深感报纸独立的重要性。新记公司一成立，就有明文规定：职员不得担任公职，以免和



《大公报》之发行课

在报道新闻时，上至慈禧太后下至地方官员，只要触犯了民族和大众的利益，英敛之和《大公报》都敢大胆揭露，无情曝光。英敛之的那个类似“社论”的“论说”栏目，就被人们戏称为“骂人”栏目。每遇到重大事件，英敛之就直接站出来发表

政党扯上关系；不接受外股和社外投资，以免受到任何社外势力的制约。

此外，新记公司又在报上登载《报社同人之志趣》一文，更加明确地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八字办报方针，并解释说：不党，